

青報會客廳

集思廣益賦能活力海洋之都 凝心聚力建設精彩宜人之城

責編 劉宗偉 美編 鄭燕 審讀 李斌 排版 林艷

2000萬字以後的風景

——訪著名作家、中國作協副主席張煒

□青島日報/觀海新聞首席記者 米荊玉

完成高等教育後的一個當代人，畢生寫作量摸高達到40萬字左右。40萬字之後，大致是沒有語文老師指導的文字探索。專業作家的寫作訓練可以進入到百萬字層級，佼佼者能發表的寫作量在300萬字左右，而能突破千萬字的作家寥寥可數。截至今年7月小說《河灣》出版，著名作家張煒發表的作品達到2000多萬字，光是被燒掉的“少作”就近400萬字。放到世界文學史和作家職業圈層，這也是一個可畏的數字。

對於讀者而言，現當代文學正處在“封疆裂土”的時期，遲子建的東北、王安憶的上海、莫言的高密東北鄉、賈平凹的陝西……自福克納發現“家鄉的那塊郵票般小小的地方我一輩子也寫不完”之後，當代作家對地域的書寫越發執著。具有廣闊的歷史視野、全景式的社會觀照、巨鯨式的文化吞吐的“百科全書式”作家非常罕見。

回顧張煒50年的創作，他的作品涵蓋了商戰、海洋、醫藥、植物學、漁業、繪畫，關注的話題包括航運、養生、網絡、婚姻、農耕、倫理，涉獵的體裁包括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童話，光是小說《你在高原》就長達39卷、450萬字。他在《心儀——域外作家：肖像與簡評》中列出了他精讀的127位外國作家，又在《遠逝的風景：讀域外畫家》中分析了其精研的35位畫家。去年出版的《唐代五詩人》凝結了他的20年古詩品鑑。今年面世的《斑斕志》則是对蘇軾的研究成果。

在2000萬字之後的文學書寫，已經沒有什麼先行者和範例可參考，同時代的書寫者也很難提供抓手和鏡鑒。張煒從1973年至今的創作歷程，辟出了新時期文學的個人路徑。作家為什麼要寫這麼多，寫這麼久？福克納認為，如果自己寫，時代會興起其他人替自己寫，替雨果、海明威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替所有的作家寫作。另一方面，讀者在一座座文學高峰面前，如何認識“閱讀”的義務，如何反抗“兩千萬字純文學”帶來的絕望？正如昆德拉所說：“我們在現實中因其過於沉重而不斷逃避的，遲早會以另一種面目出現，變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。”（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）

10月底，張煒在青島參加中國海洋大學《雪山大地》研討會，在會議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。作家往往是自己作品孤獨的衛兵，然而，張煒卸掉了普通作家對作品的保護和解釋，在“後2000萬字時期”寫作者身上，他明白文學的分量讓讀者來承受是違背本能的，這些他都預先原諒了。在採訪中他像是一個龐大之物，對著文學願景持續吐息。他堅持的是寫作者自身的責任和道德律令：一個作家把生命淬煉成2000餘萬字送給讀者之先，文學里道德的自律、美學的開掘、真理的勞作首先是作家本人的軛與重擔。

“後2000萬字時代”

記者：從1973年發表小說《木頭車》到現在，您的創作生涯已經50年了。在這麼長的歲月里，您如何總結自己對時代的書寫？

張煒：我學習寫作較早，1972年就組織詩歌小組，苦於晚成，《木頭車》是我文集里收錄的一篇小說，算起來已有50年，很像一場馬拉松長跑。實際上，我一直對自己充滿懷疑，也有疲憊的時候。我會懷疑自己的能力，懷疑走過的道路。這並非不自信，而是不停地勞動中自然出現的現象。這種懷疑和探尋也讓我產生了更大的動力，往前奔跑。我的創作儘管有興奮和滿意時候，但總體而言還是不滿意的，總覺得應該做得更好一些。

一個寫作者的高度起碼由四個條件決定：第一是先天才能；第二是後天經歷，曲折的、複雜的經歷；第三是較高的文化素養，即人文方面的學識和培植；第四是最終的，即人格的力量，心靈和道德高度。這些缺一不可。這四個方面我都缺少十足的把握，但除了先天條件不可改變，其他三個都需要更加努力。

記者：近年來不斷出現新的文學現象、文學新人，像近年來的“東北文藝復興”等現象，從文學界到影視界都很有影響力。文學研究非常關注新興起的寫作現象群體，對現象之外的嚴肅文學是不是不夠關注？著名評論家溫春橋就指出，當下對楊志軍小說各個階段的研究並不充分。

張煒：文學界關注新人，關注“後浪”，無論怎樣重視都不過分。文學事業需要不斷向前，無論我還是我的朋友，回憶成長的過程，一方面會感激關注我們的前輩，另一方面也為在關鍵環節上缺少幫助而扼腕、遺憾。必須支持年輕的創作者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，文學藝術的進步，不要指望像科技一樣，不會是線性發展的。也就是說，新的不一定比舊的好。科學發明只要不是毀滅性的遺忘或覆蓋，就一定會在前人的基礎上再進一步。而藝術的積累比較難，道德和思想的積累也比較難。藝術甚至不會進步。我們現在寫月亮也難以超過李白和蘇東坡，雖然我們現在能夠登月了，但是，有關月亮的文學書寫並未超越古人。

中國有句老話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”。這句話也包含了不斷追求真理和自洽的意思。但理解稍有偏差，就會走向嗜新癖。其實，新的東西要經過時間檢驗，舊的東西被實踐證明是好的部分，要守住更難。文學藝術也是這樣，一方面對新人、新的藝術形式要重視，同時也要知道，文學與科技創新還是不同的。很多人把對科技創新的理解挪用到藝術創新方面，那對文學有百害而無一利。文學創新主要還不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，那是廉價的。很多人只是迷於形式的改變，而不能從生命深處做出深邃的個人表達。

記者：您的創作內容包羅萬象，現在看來，好像除了科幻小說之外，其他您都有廣泛涉獵。有什麼文學話題或者文學類型是您後續想要補充的？

張煒：文學的過度分類是“小道”，而不是“大道”。英國詩人T.S.艾略特有句話說得特別好：類型化的文學再好，也是二三流的。所謂“生態文學”“女性文學”，這些量化和分類，在研究者那里也許是有意義的，但是從根本上來說，仍舊會造成對文學品質的誤解。文學過分類型化，那就做小了。文學就是生命表達，是心靈的產物。心靈面對的永遠不是簡單的类型，而是全部的生命所要面對的主觀的一切事物，是生活過程的綜合、心靈的綜合。一個人的生活哪能分

人物小傳

張煒，當代作家，中國作協副主席。山東省栖霞市人。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。2020年出版《張煒文集》50卷。作品譯為英、日、法、韓、德等40餘種文字。著有長篇小說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猥歌》《外省書》等22部；詩學專著《也說李白與杜甫》《陶淵明的遺產》《楚辭筆記》等多部；詩集《皈依之路》《夜宿灣園》《家住萬松浦》《歸旅記》等10部；長詩《不踐約書》《鐵與鋼》等。

作品獲“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”“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”“茅盾文學獎”“中國出版政府獎”“中華優秀出版物獎”“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別獎”“南方傳媒傑出作家獎”“京東文學獎”等。



■著名作家張煒。 王雷攝

核心觀點

■寫作者的高度起碼由四個條件決定：第一是先天才能；第二是後天經歷，曲折的、複雜的經歷；第三是較高的文化素養，即人文方面的學識和培植；第四是最終的，即人格的力量，心靈和道德高度。這些缺一不可。

■文學創新主要還不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，那是廉價的。很多人只是迷於形式的改變，而不能從生命深處做出深邃的個人表達。

■一個人的生活哪能分出女性、兒童或者大自然？它一定是全面的、渾然一體的，對主觀世界的生命的觸動是全方位的。作家的表達一定是“生命全息”。

■文學是不可量化的，作家也不是數量問題：數量固然重要，却不是唯一的指標。100個平庸的作家也不如一個傑出作家更有意義。當然，作家群體還是需要較大的體量，不然就不會產生傑出者。

■不能把他人的生活領域和興趣強加給別人，作為個體，要根據自己的寫作命題，深入自己的“第一線”。

■一味追求寫作數量將毀掉自己：越多越差，慣性寫作將摧毀作品的品質。

出女性、兒童或者大自然？它一定是全面的、渾然一體的，對主觀世界的生命的觸動是全方位的。作家的表達一定是“生命全息”。

偶爾對某個“類型”感觸很深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把全部文學書寫分成“類型”，做出這樣的理解，那對文學的矮化和窄化，是一種誤解。第一流文學，其女性觀、兒童的純潔天真、生態自然觀，都包含在日常的生活表達中了，而不會是一種特別的、經過歸類和劃分過的生活。

青島的“文學精英”

記者：青島文學近年來相繼獲得了一些獎項，比較獨特的現象是，外地來青作家比較容易獲獎，楊志軍老師這次

南和青島的文學發展都很好。青島甚至有可能成為山東最好的文學板塊。

當然，文學是不可量化的，作家也不是數量問題：數量固然重要，却不是唯一的指標。100個平庸的作家也不如一個傑出作家更有意義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作家群體還是需要較大的體量，不然就不會產生傑出者。打個有趣的比喻：過去《聊齋》里講的“狐狸精”，現在就沒有了，為什麼？因為古代生態環境不同，野物很多，狐狸很多，這當中才有可能產生精靈。現在除了养殖场，哪里還能找到狐狸？所以會出現一個“狐狸精”，那就不可能了。作家也是這樣，基数大，群体大，才能产生几个“文学的精灵”。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就是“文学的精灵”。

記者：您的創作生涯50多年，一直能貼近現實生活。像今年最新的小說《河灣》開始關注網絡和數據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困擾，您如何能從文本到精神都保持跟時代同步？

張煒：人們号召作家“深入生活”，其實不如改成“認真生活”。生活中很多事情要認真，要始終關注社會的發展，要始終具備一顆熱愛真理、追求真理的心。做個認真的人，就會與社會情緒絲絲相接，會發現大家在關注什麼、憂慮什麼、興奮什麼。現實生活是否讓人經常陷入焦慮和感傷當中，那是裝不出來的。認真生活才是深入生活。

生活沒有“前沿”和“後方”，也沒有“生活的第一線”。打仗可以有第一線，工廠生產有第一線，但是文學創作，要看寫作的對象。馬爾克斯有一篇小說，寫的是個人被一顆病牙折磨得死去活來，那麼牙齒問題就是他的“第一線”。不能把他人的生活領域和興趣強加給別人，作為個體，要根據自己的寫作命題，深入自己的“第一線”。

認真生活，就是不要把追求真理當成一句空話。還是要較真，太想得開的人，不太可能是好作家。想得太多，太超脫，更有可能是一個趣味作家、特色作家，而不會是大作家。托爾斯泰、歌德和魯迅，都不是超脫於生活之外的人。門外的事情什麼都不管，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，這不會是好作家的生存狀態。有的作家有錢，能比托爾斯泰資產更多？然而，托爾斯泰那麼痛苦。他直到最後還是“想不開”。

如何讀我，我如何讀

記者：您的作品非常多，而且包含了各個類型。對於新接觸您作品的讀者來說，有什麼門徑可以進入？

張煒：如果要讀，還是有年齡層次的問題。太年輕了，不要讀《古船》，它可能是“少年不宜”；太酷烈的部分不適合孩子接觸。青年人讀《河灣》比較適合，因為二三十歲的人正經歷個人的戀愛期、婚姻期，還是數字時代，如何面對個人的焦慮、等等，《河灣》在表達這些逼到眼前的問題。

如果對半島文化感興趣，可以讀《獨藥師》。這本小說看起來寫的是“長生”，是齊文化，但重心不在那裏。一個民族向著文明前進，還是向著野蠻前進，是向上提升，還是向下沉淪？追求“長生”只是一種文化，書中寫的其實不是藥，而是人的出路。

少年讀者，比較適合讀《橘頌》《少年與海》《尋找魚王》《半島哈里哈吉》；愛好文學的年輕人，從我剛起步的“葫蘆河系列”開始讀，也許會好一些。這個系列寫城鄉結合部的生活，讀者能找到生活的共鳴，同時也能看出那個時期和現在的不同：文筆的變化、對社會認識的變化。

記者：職業作家一般會有較為廣闊的閱讀視野和濃厚的閱讀興趣。處在您這個階段已經獲得了很多獎項，什麼樣的書能引起您的閱讀興趣？

張煒：我四五十歲的時候特別能讀書，像是一個機器一樣，書籍從這個進口填進去，從那個出口出來。一堆書不需要太長時間就讀完了。那時腦子反應快。過了60歲，讀書慢下來了，就像是一台老電腦一樣，反應慢了。

我不主張不停地讀、讀無數的書，“開卷有益”的說法看起來不錯，實際上可不一定對。所羅門王有一句話：“著書多沒有窮盡，讀書多使人疲倦。”這個“多”，不光是指數量，可能還指目標不確定的、無鑑別的泛濫。不要以數量為追求，還是要少讀、精讀。讀很多壞書，只能使自己更平庸。選書，除了靠個人的悟性、積累的经验，有時听听可信的人物推介，也是好的途徑。

儘可能不看那些媒體用力宣傳炒作的書，暢銷書也不要讀得太多。只要是暢銷的，往往就是短時間內跟中等水平之下的人達成一致的書，所以它不會是高級的。我不太讀暢銷書。有人說，萬一遇到好的暢銷書呢？既然是“萬一”，那就是罕見的意思，也就是說不太會遇到好的。

記者：您一直保持著高效的寫作規律，從作品數量到獎項都達到了作家罕有的高度。這種創作的密度和頻率會一直保持下去嗎？

張煒：我以前是個不停地寫作的人，但現在寫得很少了。在我看來，著書是沒有窮盡的，關鍵不在於多，而在於好。

我會寫得越來越少，越來越精。關鍵不是體力問題，我體力還可以；關鍵在於我明白了個道理：作品的數量只對極少數作家才有意義。對一般的作家來講，寫得越多越壞，寫得越多不如寫得少。對極少數特殊的作家來說，數量有意義，因為他們有一個特殊的靈魂，其生命的每一階段都很特異。魯迅說過：“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，從水管里流出來的都是水”。傑出的作家，考察其生命長河的每一段，生命的信息全都包括了。所以，數量對他們來講越多越好。而大多數作家，只會在偶爾的一段時間，因積累和努力，發揮得好、狀態好，才會寫出一個優秀的作品。一味追求數量將毀掉自己：越多越差，慣性寫作將摧毀作品的品質。

覺悟到這個道理以後，我寫得非常少了，一年里不會超過兩三次集中寫作的時間。我最愛的是詩歌，自1972年開始寫詩，興奮點一直在这里。我的詩影響不大（注：自謙，張煒長詩《不踐約書》2021年獲第六屆中國長詩獎，長詩《鐵與鋼》2022年出版）。如果一個寫作者什麼都不會干，只能寫小說，就成了小說匠。托爾斯泰、雨果也好，所有大作家的寫作體裁非常廣泛，不可能只寫一種。

得茅盾文學獎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您怎麼看待青島的文學發展趨勢？

張煒：有人在討論會上說，青島以前被稱為“文化沙漠”，其實是不準確的。這次有人還引用了王蒙先生的說法：“文學屬於藝術領域里的硬通貨。”其意思是，判斷一個地方的文化藝術如何，還要看文學；只有出現傑出的文學，才算是真正抵達了發達的水准。確實，現代文學史上，與青島有交集的作家不少，包括老舍、蕭紅、蕭軍等，都在青島留下了足跡。但他們畢竟不是青島本土作家，本土作家的數量還不夠多。

但當代文學，青島出現了很多好作家，他們有生氣，有力量。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詩歌，青島的文學作品都可圈可點。過去的文學大區，煙台在山東是最有名的，煙台的文學史一度就是山東的文學史。但是，現在就不能這樣讲了。濟